

苏东坡与海南沉香



国画中的苏东坡

本报记者 徐晗溪

西园雅集：无香何以为聚

古代文人的聚会被称为“雅集”，历史上最著名的雅集有两次，一次是发生在东晋绍兴的“兰亭集”，一次是发生在北宋汴京的“西园雅集”。兰亭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王羲之的字，而西园雅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李公麟的画和米芾的题记。

西园是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宅第花园。宋神宗元丰初，王诜曾邀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米芾、秦观、李公麟，以及日本圆通大师等16位文人名士在此游园聚会，会后李公麟作《西园雅集图》，米芾书写了《西园雅集图记》，成为仇英、张大千等后世名家摹写赏玩的典范之作。

《西园雅集图》水墨纸本，白描入画，以写实的方式描绘了宋代文人雅士聚会的情景，他们或挥毫用墨吟诗赋词、或抚琴唱和、或打坐问禅，案头上有几缕淡淡的炉烟萦绕其间。中国用香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之前，盛唐时期调香、熏香、评香已成为高雅艺术，香文化俨然成形。

到宋代，香文化融入日常生活，发展到鼎盛，文人雅士相聚品香读书，一边享受氤氲香气，一边读经谈画论道，甚至有文人感叹“无香何以为聚”。对宋代文人雅士来说，香炉里焚爇名香，是24小时不能间断的一项常规设置，氤氲的香氛差不多就和当今某些公共场所或咖啡厅的环境音乐一样，是人生展开的一个基本背景，仿佛没了它，生活便不能正常流动。

苏黄唱和：烧香赋小诗

唱和诗是古代诗人相互应答酬谢所作的诗词，士大夫间更是以香中雅趣题诗互答为文坛佳话。宋元祐年间，苏轼、黄庭坚二人以黄庭坚酬答别人送的香品（帐中香）为引子写了几首唱和诗，不单写香，且以香激赏对方之文辞、智慧，乃宋人香事风流。

黄庭坚自称“天资喜文事，如我有香癖”，爱香如痴，他的《惠江南帐中香者戏赠二首》中“百炼香螺沉水，宝熏近出江南”一句历来为人称赞，苏轼读此诗后和作《和黄鲁直韵》，称“四句烧香偈子，随香遍满东南”。苏轼诗中提到的香并非具体的香品，而是黄庭坚为酬答别人送的香品礼物而做的诗，意指黄庭坚的四句“偈子”，就像妙香一样四处飘散，为了更好地体会黄庭坚诗中的智慧，应用心参悟，就像品香一样，最好用鼻子“观”。

苏轼在《答黄鲁直书》中写到第一次在孙觉座上见到黄庭坚的诗文，“耸然异之，以为非今世之人也。”苏轼对黄庭坚称赞有加，而黄庭坚更是投书苏轼，恭执弟子之礼。两人交往莫逆，常常“互慰”，如，苏轼调侃黄庭坚的字是“树梢挂蛇”，黄庭坚则说苏轼的字是“石压蛤蟆”。他们都是爱香之人，也因“香”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。

据《陈氏香谱》记载：一次，以画梅著称的花光长老派人将两幅新作送给黄庭坚，黄庭坚便与好友惠洪一起在灯光下欣赏。望着绢素上寒姿凌峻的梅影，黄庭坚不禁感叹道：画面如此生动，让人仿佛真的置身初春清寒的梅林间，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花香。结果惠洪当即笑着从随身包裹中取出一小粒香丸，焚于炉内。很快，黄庭坚当时所栖宿的舟中便有鲜

明的梅花香气轻浮暗溢。

这一种芳韵于黄庭坚来说乃是首次体验，绝妙的效果引他赞叹不止，见此，惠洪也就很有兴致地道出了此款“韩魏公浓梅香”的来历。原来，它的配方与工艺竟是名臣韩琦府中创制出来的成果，又由苏轼掌握后传授给惠洪。黄庭坚闻言不禁开玩笑地抱怨道：苏轼明明知道他有“香癖”，当年居然不曾告诉我，真是不够朋友。黄庭坚还将此香易名为“返魂梅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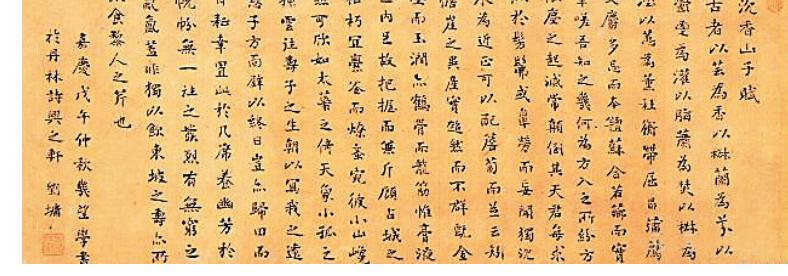
海南香事：金坚而玉润

“金炉犹暖麝煤残，惜香更把宝钗翻；重闻处，余薰在，这一番气味胜从前。背人偷盖小蓬山，更将沈水暗同然；且图得，氤氲久，为情深，嫌怕断头烟。”这首《翻香令》，是苏轼第一任妻子王弗死后，苏轼怀念其所作，描写了苏轼在妻子灵柩前焚香之景。从词中也可看出，宋人很少采取焚烤沉香片、檀香片，多是使用精心调制的“合香”。

宋时的合香工艺中最常用的方法是，把多种香料经过加工处理，捣成碎粉，混在一起，用蜂蜜、白芨、蔷薇露（天然玫瑰香水）等加以调和，然后封闭在容器内，埋入地下静置一段时间。最终将香料取出，做成小饼、小丸乃至捣成粉末，即得到成品，或宜于熏衣，或宜于待客，或宜于户外，或宜于夜晚的寝帐，乃至解酒的、安神的。

苏东坡玩香可谓已到极致。据说古代有三款香最美，分别是“雪中春信”“黄太史四香”和“返魂梅”香。其中，“雪中春信”便是苏轼所调制，需专门收集海上雪水进行合香，能于雪天闻到梅花开之意境，雪落无声，梅香盈室。

这款香的诞生，有一段如同传说



苏东坡手书《沉香山子赋》

般的故事。当年苏轼为合出早春梅花初绽时的香气，整整用了7年，一直不满意。直到北宋元祐五年正月初七的一场突至春雪，苏轼取出御赐的羊脂玉碗，吩咐侍女取梅花的花心之雪放于其中。再将炮制好的香料按顺序配好，才终于找对了味道，合成“雪中春信”。

东坡对海南沉香也十分喜爱，在《沉香山子赋》中写道：“既金坚而玉润，亦鹤骨而龙筋。惟膏液之内足，故把握而兼斤。”寥寥数语，把海南沉香的特征写得形神毕现。沉香的形成机制，是沉香树干被真菌侵入寄生，发生变化，经多年沉积形成的香脂。树龄几十年的沉香树，如果没有受伤，便不会结出沉香。

沉香实际上是树受伤后在愈合过程所产生的油脂，其生成过程，充满变故、磨难和艰辛，颇富审美和哲理意味，不由得使人联想起人生多难、命运多舛的苏轼。所以，绍圣五年二月，苏轼时年64，为贺弟60大寿，寄以沉香山子，并作《沉香山子赋》，题下注明：“子由生日作”。

此篇寿赋，笔笔未离沉香，而处处却在推扬卓然不群的品格，可谓构思奇妙。当时，正值元祐党人被大力镇压。兄弟二人，一贬儋州，一贬雷州，彼此隔海相望，心情可想而知。虽身处困境之中，但苏轼就地取材，以儋州之沉香作为寿品，以沉香山子为喻，隐喻品格贞坚的士君子，以此激励同样深陷逆境的子由。

收到兄长情深意长的生日礼物，苏轼回应以《和子瞻沉香山子赋》。赋前有小序，云：“仲春中休，予由于是始生。东坡老人居于海南，以沉水香山遗之，示之以文，曰：‘以为子寿。’乃和而复之。”弟弟对苏轼原赋的精神，可谓心领神会，在香史上，这样的唱和堪称传奇，既是骨肉亲情的写真，又是在同一心灵层次上的知音。

苏东坡玩香可谓已到极致。据说古代有三款香最美，分别是“雪中春信”“黄太史四香”和“返魂梅”香。其中，“雪中春信”便是苏轼所调制，需专门收集海上雪水进行合香，能于雪天闻到梅花开之意境，雪落无声，梅香盈室。

这款香的诞生，有一段如同传说

马可·波罗与中国面条

■ 吴正格

面条由中国传到意大利，是游历过中国并将中国系统介绍给欧洲人的马可·波罗使然。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曾在文章中写道：“同意大利朋友在一起吃面条，他们总爱说意大利面条来自中国，是当年马可·波罗从中国带到意大利的。”

为什么说是马可·波罗把中国面条带到意大利的？因为有学者发现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有关于元朝“线面”的记载。“线面”，即干制的挂面，易于保存，可携带远行，又便于随时充饥——这使马可·波罗将中国面条带到意大利成为可能。

追溯历史，马可·波罗来中国后，曾一度在政府里当官。他在长期旅行中找寻商机，进行“滚动式贸易”，主要是做宝石生意，以至于他和父亲、叔父回国时，所穿蒙古绸面皮袍的里子夹缝中塞满了宝石，故而人们后来称他的住处为“百万宅”。不久，马可·波罗为了商港、商运的权益不受侵犯，奋勇投入到与热那亚人在亚得里亚海的战争，任一艘战舰的荣誉司令，却因战败被俘。为了熬过狱中岁月，调解精神创伤，他向在狱中结识的鲁思悌谦口述了他在中国和东亚的见闻；这位写过小说的比萨战俘，用当时流行的法意混合语记录在羊皮纸上，初名“东方见闻录”。《东方见闻录》出版后，成了欧洲的畅销书，并被转译成十几种语言。可在先后出版的一百四十多个版本中，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版本——有的被节略删除，有的被删除多章，有的“将一切障碍的注释和足以阻止这种记述前进的资料，都予以删除”。删除的内容不会是忽必烈、皇宫、元大都城之类的大人物、大事件，而是诸如面条之类不被关注的小事情。所以当面条后来在意大利成名，并且影响和扩散到整个欧洲时，才引发研究者去深入思考究竟是哪位能人“首开先河”？这样，他们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发现了记录神秘东方的各种版本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，并且在未被删节的内容里找寻蛛丝马迹……

马可·波罗为行商、谋商不辞辛劳，同时也是一位敢于探索、勤于求知的旅行家。从这个观点来把脉马可·波罗的中国之行，他能将先进的面条制作技艺带回意大利，应该经过细致的认知和体验的过程，也是出于经商意愿而衍生的动机。面条是中国的发明：2005年，《自然》杂志发表了《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小麦面条》，文章披露2002年11月中国考古学家在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了一个陶碗，里面盛有暗黄色的面条，经实验测定是四千年前用小米粉制成的，这可以视作世界面条的“根”。小麦粉面条则发端于秦汉之际，杨雄《方言》里记为“托”，用手托搓面团，成饼状煮之，又称“汤饼”。东汉刘熙《释名·释饮食》中见载“索饼”，“索”就是面条的形状了。刀切面条兴于唐朝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二：“汤饼，唐人谓之不托，今俗谓之溥托矣。”何为“不托”？有释：“古之汤饼皆手抟而擘置汤中，后世改用刀儿，乃名不托，言不以掌托也。”（程大昌《演繁露》）“不托”是中国面条发展的一个标志。至宋朝，唐俗得以延续，亦因富商隆，带动餐饮业空前发展，仅《东京梦华录》和《梦粱录》中所记两宋京都食肆所卖的面条，就有五六十种。

马可·波罗来中国时，面条成为国食并已传入日本、朝鲜，乃至亚洲大部。马可·波罗肯定见过、品尝过元大都和南北洲府的各式面条，自然能感知面条的食俗魅力和惠美普罗大众的情形。加之此时刀机生产又经干燥处理的挂面已然问世，而意大利盛产硬小麦，意大利人嗜面食的历史重久远，面条遂有了“入意开俗”的投缘，进而中欧通商的情势下被马可·波罗顺合情理地带到意大利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

清代姚文瀚《岁朝欢庆图》

此图描绘过年阖家欢庆团圆的场面。男女主人端坐厅堂，孩童们则敲锣击鼓、吹笙拍板，耍玩傀儡、点燃炮竹，嬉戏于庭院中。家仆或持酒壶侍立，或端送糕果，穿梭于前厅后廊里。后院妇女忙碌准备年夜饭，远处阁楼上男仆合力悬挂大灯笼。庭院火盆烧着松枝、芝麻秸，室内布置着“四季花卉”大立屏，朱几瓶插牡丹，烘托出满堂富贵吉祥的年味。

姚文瀚（生卒年不详），清代画家，号灌亭，顺天（今北京）人。清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进入宫廷供职，擅长画人物、道释、山水、楼阁，画风工致，设色浓郁，受西画影响。



古代放年假从唐朝开始

梳理历史典籍，我们发现将正月初一定为一年之首是汉武帝时期的事情，但汉代并不休年假，而是冬至休息，放假3天。

中国古代正式开始休年假是唐朝时期，唐玄宗李隆基在一份政府文件中这样规定：“元旦、冬至，各给假七日。”冬至我们都知道，这个“元旦”就是今天的春节，当时的农历新年。也就是说，唐代春节放假7天，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。

虽然假期不短，但有些政府高级公务员却无缘享受。因为朝廷还有两个补充规定：一、文武百官和高级地方长官初一那天必须上朝给皇帝拜年，类似于今天的春节团拜会；二、各级地方官过年期间不能离开衙门，必须坚持节日值班。这样一来，京官还好办，朝拜完皇帝可以马上回家和家人团聚，但地方官就只能待在衙门里冷冷清清过年了。李隆基的重孙子唐德宗李适饱受安史之乱之苦，他即位后励精图治，过年也照样上朝工作。但大臣们不干了，纷纷叫苦，最后李适采取了一个折衷措施：单号上

朝，双号休假——看来，不论什么事情在历史上都能找到出处。

宋代基本上承袭唐制，过年放假7天，元宵节放假7天，加在一起大约半个月。地方官员待遇要好一点，每年腊月二十停止办公回家过年，第二年正月二十回衙门上班，整整一个月的假期。

宋朝对新年的称呼与唐代不同，唐代叫元旦，宋朝叫元旦。北宋名臣王安石有一首咏元旦的诗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

元代过年不休息，具体情况在此不赘。明代开国初期皇上非常勤勉，全年休假也很少；中后期假日逐渐增多，万历年期间将除夕假、元旦假与元宵假合并，从腊月二十四开始，直到正月二十结束，前后将近一个月。清代年假与明代差不多，官府在腊月二十前后封印放假，正月二十左右开印办公，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。

“春节”名字刚过百年

农历过年叫“春节”直到民国初期才开始，距今刚过百年，原来一直

叫“元旦”。

清王朝被推翻后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全国改用阳历，于是便有了公历新年，也就是今天的元旦。当时孙中山打算废除农历，但考虑到民间传统习惯，只好采取折衷办法，两历并用。1913年袁世凯主政时，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袁提出了《定四时节假呈》：“我国旧俗，每年四时令节，即应明文规定，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，端午为夏节，中秋为秋节，冬至为冬节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，在公人员，亦准假一日。”袁世凯接到朱的呈文后，考虑到当时是五族共和，将端午、中秋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似乎不妥，便只批准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，同意按例放假，自1914年开始施行。从此，正月初一便被称为春节。

由于春节是袁世凯所倡，所以许多倒使者便拒绝过春节，孙中山就曾多次提出废除春节。南京政府成立后，又有人旧话重提，认为一年当中新年在前，旧年在后，不伦不类十分荒唐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国民政府以颁行通令的方式，宣布废除旧历，禁过春节。但民间照常过。

1949年9月27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，我国使用公元纪年法，将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，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。自此以后，春节作为农历新年便被保留下来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新中国刚刚成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十二次会议便通过了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，其中规定“春节放假三天，为正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”。1999年9月18日，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迎来制定后的第一次修订，其中春节假期仍为3天，分别是农历正月初一、初二和初三；2007年12月14日第二次修订，春节假期调整为农历除夕、正月初一和初二，还是3天；2013年12月11日，国务院第三次修订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，其中规定春节放假3天，分别是农历正月初一、初二和初三，又恢复了原来的放假时间。

今年我们的春节假期，通过调休其实是7天，实际时间从除夕开始算起，至正月初六为止，正好一个黄金周。

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

历史上的春节与年假

农历新年休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历朝历代对这个假期都非常重视，有的朝代甚至休假一月之久。历朝历代对过年休假都有哪些规定？历史上又是如何放年假的呢？